

数字人文视域中的疾病隐喻*

郭琳

摘要: 在 COVID-19 蔓延全球的特殊时期, 人类生存情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形态。社会活动趋于停滞, 个体生活空间受到极大压缩, 这些与高度依赖数字媒介与技术网络的信息和物质, 共同构成了人们在这一时期的生命境况。COVID-19 迄今为止仍未消散, 对这一疾病的命名、理解与认知, 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也产生了与之相应的行为与后果。在其所引发的恐慌情绪逐渐随着医学研究的进展和过剩信息所导致的倦怠而趋于平静的当下, 需要从“感染”这一疾病隐喻在数字时代的多重意涵出发, 理解疾病认知的数字化, 并从数字情境中的疾病隐喻与生命政治等角度出发, 结合 COVID-19 的隐喻性内涵, 探讨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复杂后果, 分析和反思其对人类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数字人文, 疾病隐喻, 感染隐喻, 生命政治

Metaphor of Illnes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Guo Lin

Abstract: Living conditions have become unprecedentedly digitized due to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Social activities have tended to stagnate, individuals' living spaces have been greatly compressed, and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人文视域中的隐喻理论研究”(19BZW021)阶段性成果。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have become strongly dependent on digital media and technological network; together, these features constitut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is period. COVID-19 continues to persist. People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differing opinions on the naming,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this disease, leading to corresponding actions and consequences. With the progress of medical research and the slack caused by redundant information, the panic caused by the virus is gradually calming. It is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disease metaphor of “infe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o understand the digitisation of disease cognition. Its complex consequences for human society should also b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ease metaphors and biopolitics in the digital context and metaphorical connotation of COVID-19 to analyse and reflect on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human life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disease metaphor; contagious metaphor; biopolitics

DOI: 10.13760/b.cnki.sam.202101003

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是2020年伊始整个人类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在迄今仍未完全得到遏止的传染性疾病的蔓延期间，个体的生存情境和总体的社会常态都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变化。在疫情发展的早期，随着流动性社会活动的近乎休止，人们的生活范围与内容最大限度地缩减，以期形成对疾病传播的有效抑制。数以亿计的人们在暂时停摆的时间中闭门生活，以数字技术构成的社会网络相互联结，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进程在这样的情境之下被快速推进。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与生存的数字化，我们需要结合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与人的关系来重新思考和界定人自身。这正是数字人文这一新兴学科能够提供的认知维度、知识方法以及观念更新。数字人文可以与“疾病隐喻”和“感染隐喻”等概念共同构建起一种理解新冠疫情时期社会现实的认知框架。

在这篇文章完成之际，疫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仍未结束，这意味着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只能在提出问题和选定视角之后非常有限地展开。首先是从对疫情时期人类生存情境数字化现状的认知出发，探讨数字化传播中信息传递的感染性特征，由此延伸到对疾病隐喻以及感染隐喻等概念的理解与阐发。而后，从疫情时期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共书写来探讨其中的感染性内涵，如灾

难想象与疾病认知。最后，在这样一个还不够恰当的时机展开反思，思考疫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并试图由此来更深地触及疫情时期创伤性共在中的生命体验与社会理性。

一、疫情时期的数字化生存

从 21 世纪初到今天的 20 年间，数字技术与人的存在日渐交融，生活世界与网络世界不再被当成是可以简单地加以区隔的现实与虚拟空间形态。特别是在新冠肺炎肆虐的初期，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的交流在维系基本的个体生存和必要的社会运转的前提下，缩减到以网络信息传递为中心的形态。

生物性病毒所导致生活形态的骤变，不仅意味着常态的丧失与对常态思维的突破，也要求我们将与疾病相关的变化、风险以及更多的潜在问题与可能性纳入思考。在生活被圈禁于一室一隅的特殊时期，所有人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着疫病之灾，身处危险之中，或是通过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渠道来了解信息，关注并感受疫病带来的变化。

思考疫情期间的生命体验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首先需要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并由此来重新定义人类的生存情境。就这一点而言，数字人文这一新兴知识领域能够在探讨技术与人类关系方面提供理解数字化的社会现实的思路与方法，带来必要的认知更新。譬如人们翘首以盼的疫苗，就是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生命进行改造或改善的例子。而网络基础设施与计算技术的发展，则使社会在疫情期间实现极为迅速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可能，这也正是广义层面的数字化生存现实。除此之外，个体在这一时期的生存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可以尝试从一些学者与艺术家的思与行中来感受数字化存在的具身性与反思性。

2020 年 3 月 24 日，中国学者戴锦华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瞰见》云课堂有声版的对话中论及对这次疫情当中的“亲历”的看法。她认为，即便疫病已在全球蔓延，我们仍不能说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亲历者，“真正亲历的是那些染病的人，是那些在一线救助的医护人员，是那些不能躲在家里的劳动者”（戴锦华，程亚婷，2020-03-24）。大多数身处一室，在隔离状态下得以安然度过这一时期的人，对这场危机的体验更多的是经由铺天盖地的信息而获得的一种间接体验。生活的主题除了存在本身，几乎只剩下对疫情的关注。戴锦华认为，对于间接经历了这场灾难的人们而言，疫病对其所产生的意义可能仅限于与之相关的反思能力。当一切日常都被粉碎，人们应当

在这个时候思考自身的生活方式、文明的价值以及生存的脆弱性。戴锦华也探讨了由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构成的数字化生存状态，并谈到自己曾经设想过作为一种体验的人类社会的实际交流，会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被数字化虚拟交流的形式取代。她认为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诸如网络授课这样的数字化交流形式，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其在技术层面或教育方面的质量是怎样的，“而是在于它的想象的‘共享’，和实际意义上的‘分离’”（戴锦华，程亚婷，2020-03-24）。

2020年3月26日，德国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Anne-Sophie Mutter）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次日就与伦敦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一道，以分屏连线的方式演奏了贝多芬的《降E大调竖琴四重奏》（String Quartet No. 10 in E-flat Major Op. 74）。穆特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以分屏的方式演出，所有参与演出的音乐家都保持着足够安全的距离。就在确诊前一周，穆特曾上传了自己在家中的独奏视频，并发声呼吁人们耐心居家隔离，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疾病的传播。

穆特的演奏与观点传递出疫病蔓延期间稀缺的兼具人文关怀性和艺术光晕感的声音，也印证着戴锦华的观点。在数字传播时代的复杂媒介情境中，不仅信息的传递极为迅捷，而且一切声音都因可见度的提升而被放大。而人类在数字情境之中的存在，更有可能的常态是肉身的分离与虚拟的共在。在这种情形之下，病毒与网络同构，病毒取其本义，在网络中以传染形态被传递的信息往往与前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隐喻，这就是“感染隐喻”。

二、从疾病隐喻到感染隐喻

“疾病隐喻”就其内涵而言，正如苏珊·桑塔格早已阐释过的，恰恰是一个为了表达对疾病的文化表征的反对而诞生的概念。而“感染隐喻”则是近年来沿着桑塔格的研究衍生而来的概念，其内涵较之前者更为复杂，与数字技术时代的思维相关，也与疫情时期的信息传播和情感传递相关。

人们对疾病，特别是对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的恐惧由来已久。在20世纪后半叶，对疾病的神秘化与祛魅的思考，经由桑塔格的生命体验与反思得以开启新的思路。她将疾病的神秘化想象与表征看作陈旧的隐喻。桑塔格从自身罹患乳腺癌的体验出发反思疾病背后的想象关联与文化内涵，并呼吁人们不再将疾病视为隐喻，因为“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2003，p.5）。正

如她在《疾病的隐喻》(1977)与《艾滋病及其隐喻》(1988)中所强调的,疾病的社会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所带来的恐惧与想象,是在疾病所带来的生理性痛苦之外被加诸患者的另一种苦难。

沿着这一思路,再加上隐喻在语言与思维中普遍存在这一在当代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具有共识性的基本观点,米切尔(Peta Mitchell)将关于疾病隐喻的思考进一步聚焦于感染隐喻(Contagious Metaphor)。她指出,在今天,作为人类思维方式的隐喻的普遍存在已毋庸置疑,而感染这一具体的隐喻也同样是无所不在的,“它描述了我们使用社交网络,以及思想在社会中传播的方式”(Mitchell, 2012, p. 1)。米切尔表明,以“感染隐喻”这一既模糊又有歧义性的概念作为书名是有意为之,意在表达对传染性疾病的理解是隐喻性的。这一观点当然是源于桑塔格的疾病隐喻,换一个角度来看,对隐喻的理解也可以表述为传染性的。也即是说,人们往往是以隐喻而非医学话语字面意义的方式来理解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也以有类于疾病传染的方式来传递对隐喻的理解,这也符合人类思维中基本隐喻的传播方式。

疾病隐喻的蔓延,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瘟疫,亦即感染隐喻。由此可以看到,感染并不仅具有其字面意义所表述的内涵,即与疾病的物理传播相关;在医学科学话语的范畴之外,社会文化形态的感染性也日益成为理解和把握数字技术时代的社会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隐喻。譬如“病毒”作为隐喻,很早就已从医学领域延伸到计算机领域,成为基础语汇,而在当下则需要重新回到其原始意义之中来理解和把握。不仅是病毒,“传染性”等医学术语也日益成为当代话语中的常见隐喻。米切尔指出,这类话语的兴盛与近十年间社交网络的蓬勃发展相关,这类隐喻在社会话语中的表现形态多样而普遍,涉及情绪、心理、金融等诸多社会文化领域,从身体与医学等原义的表达延伸到了精神以及更广泛的层面上,如思维方式的传播形态、理解力、观念类比以及情感需求等。她也认为,在各领域的相关研究中应当更加关注和强调感染的社会影响,因为“情感感染或恐慌的传播速度要高于潜在病毒本身,无论是金融病毒还是生物病毒”(Mitchell, 2012, p. 2)。从疾病本身的传染性与流行性到恐慌情绪的产生与传播,在物理传染与情感传播之间的类比并不鲜见。米切尔认为:“物理和心理或情感之间的这种相关性或对应性是最早的疾病传播医学理论的核心,甚至在‘传染’这个词的词源中也是可以检测到的。这使得在字面意义上的传染(微生物、医学、物理)和隐喻意义上的感染(社会文化、情感、精神)之间划清界限的观点成为问题。即便如此,最近接近流行病学语言的一系列学科创造似乎表明,感染仍然是一个难以捉

摸和丰富的暗示概念，继续超越其文字/医学定义的界限。”（p. 5）

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中，传染的原初意涵被再度唤醒，与其作为思维与情感的传播方式的内涵共同构成了其在这一时期的语义。对感染隐喻的内涵，首先需要在其作为疾病的基本内涵这一层面来从医学的角度展开探讨，其次是在数字信息传播的层面，最后是在情感与情绪的安装这一层面，探讨由特殊时期的共同生存体验产生的对疫情的社会性后果的想象与书写。

三、疾病认知与灾难想象的数字化

疾病认知首先需要从对疾病的命名开始。正如美国医学史学家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E. Rosenberg）所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疾病的命名过程在社会学和医学思想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人的身份的各个方面都是被建构的，疾病也是如此。”（1992，p. 306）因其会对个人行为 and 公共政策都起到暗示、约束与合法化等影响，所以从社会和情感等层面上来解释疾病是极为重要的。也正因此，COVID-19 这一去地域化的正式名称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个体和区域的污名化。而从被不当使用的“武汉肺炎”或“中国肺炎”等称谓中，人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对疾病名称意义指向的关注与目的，以及对其符号与叙事功能的滥用。可以说，COVID-19 的命名过程充分体现出了医学知识与社会认知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疾病的命名对普通民众产生的复杂影响。

个体对包括病毒所引发的疫病在内的灾难的想象，首先是基于其医学知识及其对科学的总体认知，以及个体与疾病相关的自我认知与身份构建。传染病患者与疾病相关的身份建构是多重的，并会导致复杂后果。从患病者到潜在的感染源，甚至是零号病人或超级传播者，这些身份往往会不断变化，个体对身份的理解、认同与歧视，都在数字化社会情境中被放大或聚焦。

从疾病的命名到患者的身份转换，再到基于生存体验的书写，以及恐慌情绪之下的灾难想象，不同的维度构成了疫情期间的生命叙事与社会创伤。

疫情书写有诸多的维度。在近期，既有作家、学者、志愿者和普通民众的个体叙事，也有各专业媒体从疫区发出的新闻信息与深度报道，更不可或缺的是医学界人士的专业知识与各种形式的科普文本。但即便是基于医学知识的科学话语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减并剔除情感与虚构，由于人类科学认知的当下阈限，这样的书写也必然包含对自身话语边界和有效性的反思。医学科学研究者科丁利（Michael G. Cordingley）认为，“我们对病毒进化的研究必

□ 符号与传媒 (22)

然集中于试图理解和解释过去的事件。但即使是向后看，进化病毒学家也会被迫做出假设”（Cordingley, 2017, p. 236）。但整个人类医学史上的数据都并不足以作为假设的文献材料，遑论作为模型数据层面上的参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努力获取病毒进化的知识以预知未来。这种行为在他看来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威胁是指潜在的未来结果，而人类社会迫切需要评估和理解病毒在未来几年对人类健康所构成的风险”（p. 236）。这意味着在这一论题上真正有效的思维方法是扩大对未来进行讨论的基础，但这些“未知的未知”即我们不知道自己并不知道的事情，其阈限和因素很难量化，更难被纳入现有范畴并以当下的标准来加以监测，其因性质的无形与不可预测而无法被有效评估。科丁利所描述的正是人自身及其认知的有限性，这当然指包括医学领域在内的全部科学知识。

疾病是难以捉摸和定义的，既属于生物学事件，又涉及世代传递的命名指称，在反映医学界的知识及其制度的历史的同时，也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相关，更关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心理身份及其对文化价值观的认可，以及医患互动过程中的结构性要素。也正因此，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层面的疾病认知，都需要以多维度的知识作为基础。特别是在数字技术时代，疾病认知的数字化与数据化，更是日益需要关注与理解的现实。

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COVID-19 全球实时数据系统”，其所提供的疫情可视化地图由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制作，在疫情刚开始的一周左右（1月22—31日）原本是依靠人工收集数据（根据地图开发者之一，土木工程系副教授劳伦·加德纳 [Lauren Gardner] 在《柳叶刀》子刊 *Infectious Diseases* 发表的文章），每天早晚发布一次数据。从2月起，该项目随着疫情的扩大也转变到半自动化的实时数据流模式，将人工收集与自动更新相结合，更有效地处理了日益复杂的疫情数据。数据来源丰富多样，疫情地图的首页列出了诸多相关的信息来源，如世界卫生组织、各国疾控中心与地区卫生部门、各类社交媒介平台与新闻网站以及医学网站等。主持设计该系统的劳伦·加德纳与两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董恩盛和杜鸿儒）是负责该系统运行的核心成员。在论文与采访中，他们均表示，原始数据的详细程度，会影响该数据地图所能够呈现出的内容的丰富程度；要保证系统的良好运行以及地图所呈现出的信息的可靠性，需要从数据的来源、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对数据的动态整合以及服务器的稳定性等复杂层面上加以考量；当其所提供的疫情数据不断升级细化，从大的地区到更小的区域，数据处理所涉及的工作量以及系统的复杂程度都会有指数级的增长。

与之相类的数据中心还有很多，譬如 Tableau 的 COVID - 19 数据中心，以中文形式提供每天不断更新的感染率、热点与趋势等疫情变化的可视化数据。进入支付宝的疫情数据入口，也能够以数据流的方式获取各国疫情数据以及相关要闻的实时更新。此外，《纽约时报》也在其网站上以数据可视化的方式来向公众解释病毒携带者怎样通过出行将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并附上了简要的说明：“我们分析了数以亿计的人的行动，以此来说明为什么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旅行限制来阻止疫病的爆发仍然是不够的。”（Wu, Cai, Watkins, Glanz, 2020）在不断变动播撒的点状动态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武汉封城之后，病毒传播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被阻断。但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全球化社会中，即便是封城这样在常态社会中难以想象的处理方式，也无法完全阻隔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蔓延。

疫情相关信息的数字化与数据化会对疾病认知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关乎人们对疾病的理解，更不只是医学叙事的不同方式。疾病信息传播的数字化，疾病认知过程中数据的充塞涌流，以及由此显现的疾病信息与认知的数据化，都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主题。而生存空间的挤压与绵延不绝的信息流，也构成了疫情时期呈现为失衡状态的人类生命本身。生活中各种领域和要素的数字化与技术化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被迅速推动。健康码、网课、直播网购、连线合奏、在线会议、阳台上的音乐会等，疫情期间人们生活的各种要素与内容，都在急速变形中被重塑。

四、数字情境中的疾病隐喻与生命政治

就在穆特公布病情的同一天，法国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在线发布了《论疫情》一文。他在文中谈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公开讲话中使用的隐喻：“我们身处在一场战争之中。”巴迪欧认为，这一隐喻的使用是必要的，“无论是战争还是流行病，都会迫使国家实行有时甚至超出其阶级性质的正常活动的做法，以更具干预性的方式来避免更大的灾难”。对于处于隔离状态的生活，巴迪欧坦言：“我阅读了太多东西，也听到了太多东西，周围的人表现出的不安也使我感到不安，他们完全无法适应我们所处的这种非常简单的情况。正如伊丽莎白·鲁迪内斯科向我指出的那样，太多的人认为，与其有效地对抗悲剧，倒不如享受之。”（Badiou, 2020 - 03 - 26）马克龙的政治隐喻以一种微型叙事的方式简洁有力地唤起了民众对事态严重性的认知。在瘟疫即战争的表述中，一切基于后者的历史认知都被调动到关于前者的想

□ 符号与传媒 (22)

象当中。而关于疫病的恐惧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导向了需要以行动来寻求生存可能性的战争思维之中。政治隐喻的微型叙事话语形态，往往被视为感知和理解现实的关键。

巴迪欧的观点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与诚挚的人文关怀。他批评公共媒介平台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在疫情期间的主要作用是使麻痹症蔓延，以及传递无节制的谣言和无限翻新的愚昧主义；他呼吁，在这一特殊时期，信息的传播应当基于流行病相关的科学数据，社会政治力量则应留给医院等公共卫生机构和学校等教育机构，并关注弱势群体护理等其他方面。巴迪欧认为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与生命情境的理解，需要在对疫病的认知与反思的前提下开展。而有效的思考始于探讨疫病对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这将会给人类生存带来怎样的影响。除了感染、疾病、痛苦、死亡和恐惧，疫病还会从怎样的层面上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影响？这一问题也敦促我们进一步关注在数字社会共同体中以各种形式涌动的关于疫病的信息洪流以怎样的方式和形态在构建我们关于灾难的想象和基于生存体验的书写，以及关注源于恐慌情绪的叙事。

各种数字形态的疫情地图使人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一个由病毒散布而形成的全球化网络。从个体防护到日益升级的交通管制，再到城市或更大范围内的区域封闭，为避免感染疫病，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抛开社会文化惯性，致力于减少现实层面的交流。也有学者从全球化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反思疫病的广泛传播。如英国学者桑普森（Tony D. Sampson）以病毒的传染和蔓延等隐喻来描述爱情、欲望与恐惧等人类情感在这一时代的传递。新的流行病学范例、形态繁多的传染模型，都被看作感染隐喻的不同形态，“金融危机、社会影响力、创新、时尚，甚至人类情感也被理解为病毒，一切都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Sampson, 2011, p. 1）。桑普森指出：“在当前越来越多的作者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网络科学、经济与商业等角度出发，思考传染理论与当今时代的相关性，并唤起了人们对传染理论的兴趣。……一些报告指出，网络技术所带来的连接增强可能会引发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层面的传染，从而增加感染机会。”（p. 1）社会科学家简·范·迪克（Jan van Dijk）就曾指出，在网络社会连接太多的情况之下可能出现新的技术脆弱性和漏洞。桑普森补充道，范·迪克避开了乐观的乌托邦式网络民主化思路，他设想了“全球交通网络的扩散使得这种社会模式容易受到生物疾病传播的

影响”（Jan van Dijk, 2006, p. 187）^①，这也正是今年以来全球人类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中的一部分。网络技术带来的连接增多与增强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层面上的感染，过多的连通性导致新的漏洞的出现，使社会容易呈现出类似于生物传染模式的疾病。譬如计算机病毒与蠕虫的破坏性影响，网络规模越大，受到传染的规模也越大，所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越严重。各种意义上的可渗透边界在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作为坚实屏障的有效性备受质疑，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就在这一层面上与流行病学的逻辑产生了密切关联。

加勒特在《逼近的瘟疫》中也曾以 SARS 为例反思全球流行疫病给人们带来的复杂后果，“通过征服者、战争、商人、运输中的动物和食品，疾病早已形成全球流行之势。不过 SARS 更代表着一种神秘的流行病在一个新世界的出现，这个新世界利用 20 世纪难以想象的方式，通过经济和空中交通，彼此紧紧地连成一个整体”（2008, pp. 3 - 4）。他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任何边界都越来越难以阻隔人们之间的联结，特别是“从微生物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政治边界从来就没有挡住它们流行，尽管大多数公共卫生官员都采用监测、隔离、接种及其他各种方法，企图将微生物‘阻挡’在国门之外。当人和物在地球上还只是缓慢移动，冷战将地球分割成若干禁止出入的区域的时候，通过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还有可能减缓微生物越界进入他国的速度。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p. 4）。他也强调，微生物的生存条件变化究其根本仍是人类行为的后果，而这些行为往往还将给农业和畜牧业以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难以想象的危险。与之有类，杜克大学教授普利希拉·沃尔德（Priscilla Wald）曾援引《新闻周刊》在非典期间的报道文本，总结出其所体现出来的“医学本土主义”，并指出“这一源于历史学家艾伦·克劳特（Alan Kraut）的概念，是用来描述对移民群体的侮辱如何通过其与传染病的关联而被证明是合理的；它暗示了一种近乎迷信的信念，即国界能够提供抵御传染病的保护”（Wald, 2008, p. 8）。她也认为“全球化是疫病爆发式传播的根源”，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之中，“微生物通过航空旅行、商业和资本循环而流通，也导致了可预测的接触焦虑”（p. 25）。她的这些观点在当下仍可用于描述疫病的全球传播及其所引发的问题。

① 简·范·迪克在其著作《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特征（第二版）》中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媒介与生态系统等方面探讨了网络社会的不稳定性，包括文中所提到的这一跟当前现实相似的情况。（Van Dijk, 2006, p. 187）

□ 符号与传媒 (22)

在疫情期间，也有学者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英国社会学家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就在 2020 年 3 月 20 日发布于“雅各宾”网站上的《COVID-19 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一文中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而全球化的当下后果之一正是“阻止新疾病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传播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已被以往的经验证明，也需要人们基于当下的生存现实来重新理解。他进一步指出，以 SARS 来简单地衡量和预测 COVID-19，是导致世界其他地区未能更好地防御其感染的重要原因。哈维还分析了当前的主要防控思路和方法，并认为中国和新加坡的方法“从总体上来说是极其有效的”，而特朗普拖延了数周这一事实很可能让民众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此外，他也强调传染病不会承认阶级或其他社会障碍和界限，同时呼吁关注因所处社会阶层或工作性质而身处于医院或机场等环境中的更容易受到感染的劳动者，以及可能因此而进一步拉开的社会鸿沟。

除了从全球化的后果等层面来探究其原因，哲学家们更多的是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时期的个体生存与社会问题，思考疫情之后生命与社会形态的可能性，或关注疫情之后的社会秩序与公共理性的重建。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 (Byung-Chul Han) 在 2020 年 3 月 23 日发表于《世界报》(Die Welt) 的文章《我们不应在病毒面前丧失理性》(“Wir dürfen die Vernunft nicht dem Virus überlassen”) 中同样强调了数字技术与社会现实的复杂关联与影响。他认为疫病在全球导致大规模恐慌的原因之一正是人类社会的数字技术化。韩炳哲指出，在这样一个“无边界的消极社会”中，“数字化正在消解 (abbauen) 现实”。确切地说，数字化是通过消解对抗中的否定性来融化现实的。在充斥着假新闻与合成图像的后真相时代，与其相伴而生的是对现实的漠不关心。而在当下，真实的病毒引发了社会剧变，但大多数人对这样的灾难性现实可以说是缺乏现实感的。这种现实感的匮乏主要体现为自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到诸多普通民众无法基于现实的变化去调整自身固化的思维模式，而坚持以常态化思维和简单的类比去衡量疫病将造成的后果，更无法在此基础上去建构关于未来的复杂推论乃至想象。关于这一点，已近百岁的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 (Edgar Morin) 也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接受《新观察家》杂志的采访之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分析了新冠肺炎流行所带来的全球卫生危机。莫兰指出，隔离对个体而言不应仅意味着一种孤岛式的生存，而是摆脱常规化与机械化的生活方式的契机，病毒和以往的灾难一样，迫使人类思考生态危机、核武器问题、经济发展的紊乱态势，

“这些灾难为人类构建出一个自己尚未意识到的命运共同体”。莫兰除了指出人际关系和时间观念都会发生大的改变，还强调了共同体视角与复杂性思维的重要性。

此外，韩炳哲也就阿甘本与齐泽克等哲学家在疫情期间提出的与社会现实数字化相关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接续了齐泽克的论题，探讨了后者所提出的病毒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致命打击，以及由此萌生出某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可能性。韩炳哲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数字化监控将在疫情结束之后极大增强，正如阿甘本所担忧的那样，基于算法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会使例外状态成为常态。^①

这些在疫病蔓延期间诞生的哲学论争，在危机情境中运用可能的媒介，以自身的生存与智识的极限为界，尽可能发出声音并就现实议题展开探讨，体现的正是一种具身性的生命政治形态。除了上文略有提及的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韩炳哲、哈维、戴锦华等，还有许多中外学者，如让-吕克·南希、埃斯波西托、拉图尔、弗里德曼、蓝江等，在疫情早期就以论文、访谈或社论等形式迅速就这一社会主题发出声音。除了对疫病的灾难性后果表达关切和从各自的学术领域进行思考，可以看到的是，学者们的关注逐渐汇集到病毒对社会的共同体化重构，各种固有边界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的交相渗透，以及这一因灾难而得以清晰显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在疫病蔓延的危机中对数字技术的依赖。至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病毒以生物形态蔓延，信息在数字空间播散，个体的、分离的人类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社会交流形态，但人们又以融合了数字信息的方式在世界中以新的形态空前紧密地联结共生。

引用文献：

戴锦华，程亚婷（2020-03-24）. 历史和人民的记忆——亲历“疫情”与“宅生存”.

^① 阿甘本先后在意大利《宣言报》（*Il Manifesto*）和 Quodlibet 出版社的博客上发表了疫情相关主题的社论。齐泽克也在疫情期间发表了若干篇社论，探讨疫情下的多重社会危机以及社会秩序变革的可能性。在2020年3月19日于RT电视台发表的社论《COVID-19 疫情的最大威胁不是退回适者生存的暴力，而是人性面具下的野蛮》中，齐泽克明确表示自己不赞同阿甘本的观点。阿甘本在2020年3月17日的《声明》中写道：“我们的社会不再相信除赤裸生命之外的任何东西。显然，意大利人愿意为患病的危险而牺牲几乎所有的一切，包括正常生活、社会关系、工作，甚至是友谊、情感以及宗教和政治信仰。赤裸生命以及失去生命的危险，并不会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而是让人盲目和离散。”（Agamben, 2020）齐泽克则认为，实际的社会现状并不像阿甘本所描绘的那样清晰，“新冠疫情确实将人们团结在了一起”（Zizek, 2020-03-19）。

□ 符号与传媒 (22)

- 获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yyN95xXZcl4tfAFxx13CCA>.
- 加勒特, 劳里 (2008). 逼近的瘟疫 (杨歧鸣, 杨宁,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桑塔格, 苏珊 (2003). 疾病的隐喻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2020). COVID - 19 全球实时数据系统. 获取自 <https://github.com/CSSEGISandData/COVID-19>.
- Agamben, G. (2020 - 03 - 17). *Chiarimenti*. Retrieved from <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chiarimenti>.
- Badiou, A. (2020 - 03 - 26). Sur la situation épidémique. Retrieved from <https://qg.media/2020/03/26/sur-la-situation-epidémique-par-alain-badiou/>.
- Gordingley, M. G. (2017). *Viruses: Agents of Evolutionary Inven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n, B. - C. (2020 - 03 - 23). Wir dürfen die Vernunft nicht dem Virus überlass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elt.de/kultur/plus206681771/Byung-Chul-Han-zu-Corona-Vernunft-nicht-dem-Virus-ueberlassen.html>.
- Harvey, D. (2020 - 03 - 20).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 - 19. Retrieved from <https://jacobinmag.com/2020/03/david-harvey-coronavirus-political-economy-disruptions>.
- Mitchell, P. (2012). *Contagious Metaphor*.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Morin, E. (2020 - 03 - 18). Le confinement peut nous aider à commencer une détoxification de notre mode de vi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ouvelobs.com/coronavirus-de-wuhan/20200318.OBS26214/edgar-morin-le-confinement-peut-nous-aider-a-commencer-une-detoxification-de-notre-mode-de-vie.html>.
- Sampson, T. D. (2011). *Virality: Contagion Theory in the Age of Network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ableau (2020). COVID - 19 Dashboar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ableau.com/zh-cn/covid-19-coronavirus-data-resources>.
- Van Dijk, A. G. M. (2006). *The Network Society: 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 (Second Edition)*. London: Sage.
- Wald, P. (2008). *Contagious: Cultures, Carriers, and the Outbreak Narrativ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Wu, J., Cai W., Watkins, D. & Glanz, J. (2020 - 03 - 22). How the Virus Got ou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3/22/world/coronavirus-spread.html>.
- Zizek, S. (2020 - 03 - 19). Biggest threat Covid-19 epidemic poses is not our regression to survivalist violence, but BARBARISM with human fa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t.com/op->

ed/483528 - coronavirus - world - capitalism - barbarism/.

作者简介：

郭琳，博士，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隐喻理论与数字人文。

Author:

Guo Lin, Ph. D. , Lecturer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etaphor theori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Email: hayashi77@foxmail.com